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1

2009年6月3日

苦難的價值

北京友誼醫院 柏曉利

2009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40週年。對這個幾百萬城市青年向農村邊疆的遷移運動始終眾說紛紜，站在不同的角度有著不同的說法。作為個人，滄海一粟，是在疾風暴雨的裹挾下，是在一種連續十幾年理想主義教育下的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但我去兵團確實是我的選擇，原本我是分配在北京工廠的）。為什麼選擇離開北京，現在看來，除了理想主義的驅動，還有個人心理上的一種需求。不管何種動機，上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它的客觀作用是使我們這些城市知青看到了我們在課本上看不到，在城市生活中永遠也不能體驗到的生活。

在內蒙二師十一團七連的日子，有許多事情不能忘記。

忘不了，在泛鹼的麥田裡為了讓冬小麥頂開鹼殼，每個人拉著鐵絲做的壓著磚頭的耜子在一眼望不到頭的麥地裡耜地。粘粘

的鹼殼很快就將鞋子粘的提不起來，很多人不得已光著腳在帶有冰碴的鹽鹼地裡走來走去。

忘不了修揚水站的經歷。學做泥瓦匠的男排戰士砌著揚水站的蓄水池，為了不讓水位超過工作面，女排就像保證主力部隊打勝仗的游擊隊一樣，用臉盆從池子裡往外淘水，一個班的女排戰士站在冰冷的水槽中一盆盆將泥水舉過頭頂傳遞出去，禦寒的毛衣毛褲完全禁不住水滴的侵襲，很快就濕透了。

忘不了，冬天在烏梁素海打蒲棒和葦草的驚險。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每個人揹著放著蒲棒的麻袋，突然，一片沒有凍結實的冰面塌陷，我和另外兩個人掉進冰冷的海裡，掙扎著拚命爬到冰面上，結果導致更大面積的冰層塌陷。生死邊緣的無助和絕望讓北風的凜冽黯然失色。

忘不了收割的季節。每天早上不到五點已經走了幾里路到了海三號地。海子號的地分別被命名為海一、海二和海三號地，海三號地是全連最整齊但也是最長的，每人平均五壟麥子割著往前走，一、兩個小時到不了頭，自然也就直不了腰。那時候的連隊，對女生沒有照顧，生理原因導致許多人體力不支。下工時，每人還要揹上十幾捆將近七、八十斤的麥子走半個多小時回到場院，你可以看見，下工時向西的方向追著夕陽一座座小山向前移動，小山的下面有我的副班長閃靜宜和其他人。偶爾，不要求揹麥子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隨著下工號吹響，鐮刀一扔，每個地埂上都有仰面朝天躺著的疲憊不堪的女生，那是為了讓地埂的凸起支撐起自己就像斷了的腰部。

還不能忘的是挖大渠。內蒙是鹽鹼地，只要是種地，就必須有灌有排。不管是灌水渠還是排水渠，都按照大小規模分為幹渠、隴渠和毛渠。排水渠要求更深。按區域，排水渠被冠名以第幾排

水幹渠。通常，每年團裡是用大會戰的方式組織。那年我們七連的任務是挖第八排水幹渠，簡稱八排幹。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步行 30 里路到工地，每人兩方土，任務完成後再走 30 里路回連隊。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季，從裡到外地冷，直到每個人的心底。那段時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男女排似乎失去了相互的幫助變得漠不關心。男女同工，男排能夠在四、五點完成任務就回連隊，而女排卻因為體力不行，無法一下將泥土甩到渠頂部，需要兩個人合作，這就耗費了更多的人力和時間，四方土一直要幹到天擦黑。通常回到連隊已經是晚上十點。挖大渠的農活持續了至少十天，天天如此，幹完一天活回連隊的途中，大家經常是邊走邊睡，十三班戰士王金花就是因為睡著了才走到拖拉機和鐵耙之間造成了腿的骨折。

誰也不會想到上房揭瓦的活會交給我們班。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十三班被要求拆掉已經裂了山牆的禮堂，並且不能摔壞一塊瓦，禮堂的房脊高有七、八米或者十米，趴在已經掀掉了荆笆和泥土的光禿禿的梁上，再拆下一根根椽子，向下望去心驚膽顫。當時是否會有其他的退路可選，我不清楚，擔當這個任務的有施天燕、孫玉芬等。她們克服了心理上的畏懼，最終圓滿完成了任務。這次任務的完成奠定了十三班以後在連裡工作中必挑重擔的地位。

忘不了冬灌。在當地，澆地的活是男人的專利，在兵團工作卻不分男女。深秋的內蒙晚上氣溫低於零度。大片的麥地每一塊都要澆，又不能大水漫灌，所以我們必須盡可能保護好每一條堤埂。但常常事與願違，有時甚至毛渠口整個被水沖走。為了完成任務，我不知道十三班有多少人，有多少次跳進水裡用身體堵口子。這麼多年，我會常常想起冬灌的夜裡堤埂上馬燈移動的光亮，

那是施天燕、季玉琴、韋金娣、張青青她們，那光亮似乎在說：“班長，放心，我們在巡視著！”

我的班裡還有很多人，當時的十三班一共有 18 個人，是全連最大的一個班，負責種子田、試驗田、果園、瓜地和 920（植物生長刺激素）。全班分五個小組各司其職。班裡有一個高中生叫王惠君，綽號酸酸，在有時間的日子裡，她負責給班裡講課，畢竟我們班最小的游江峰剛剛 13 歲就來到了兵團，而按正常年齡來到兵團的我，那一年是 16 歲。

忘不了的事情還很多。

糧食入庫，十六、七歲的我們每人揹上二百斤麻袋走在跳板上……。

中午吃過飯，連長要求大家去脫磚坯，“業餘時間作貢獻”，20 多斤的一塊坯，一中午連和泥帶脫坯要出十幾塊……。

挖大渠，沒有水喝，無奈深挖地，用手拍，地下水一點點滲出來，每人趴在地上舔兩下水……。

到團裡拉磚，背上披條麻袋就衝進高溫的磚窯，後背上十幾塊發燙的磚頭烤著背，燙著脖子，疼痛難當……。

胳膊骨折，連裡衛生員鼓搗了一個月後，照片子才發現沒有復位。連長、指導員和團裡軍醫一起按住我，將胳膊重新拉開再次復位，撕心裂肺的疼痛，整個人好像被扯成了兩半……。

當然，艱苦的生活中還有很多快樂的事。那年代，只有在春節等大的節日才可以吃到有油水的菜，平時吃的是糜子米、窩頭，有時是 95 粉的饅頭，有時是吃從外地調運來的，由於運輸不當已經發霉的白薯乾。那次，不知連裡怎麼搞到了可以炸油條的油。全連三百多人圍在操場，吃炸油條，連裡為這頓油條特意開了班排長會，規定是只許吃不許拿，看著男排為了多吃，圍著操場邊

走邊吃，讓我們好不羨慕；為了和男排搞好關係，關鍵時刻希望他們出手幫我們，女排會省出自己的口糧，隔著牆大喊一聲將饅頭或者窩頭送給與自己對應的男排班，牆頭上放著擱著主食的筐籠，牆那邊一隻手就會將筐籠拿走。過年連隊包餃子，沒有擀面棍，鐵鍬把修理修理就能用，沒有容器盛餃子，誰的臉盆當便盆的次數少就會被選用。第一頓的餃子論“個”，第二頓是片湯，第三頓變漿糊，但每一頓都那麼享受，那麼讓人滿懷期待。

娛樂生活是團裡來了放映隊。全連集合大家拿著自己編的蒲墩跑到一連，《列寧在十月》、《奇襲》、《地道戰》、《地雷戰》往返十幾里路，幾個片子的對白都會背下來了，但似乎永遠也看不夠，回來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抻著嗓子嚎著京劇“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險……”義薄雲天、肝膽相照的情誼和著歌聲回蕩在深藍色的夜幕中。

最好的事是有書看。連裡如果有好書很快就會通過排長王向東傳來。最清晰的記憶來自《牛虻》，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晚飯時排長拿到了這本書，第二天早上就得還，書是排長借的，當然她先看。晚上十一點她看完了，我接班看。自製的墨水瓶煤油燈，一點點光亮，早上六點，看到了牛虻被押上刑場和留下的遺書，看到主教大人悲淒的呼號，內心深處一種力量被鼓動著向上昇騰：一個人如果選擇了自己的目標，就要為它全力承擔，牛虻能吃苦而毫不訴苦的精神感動著我們。放下書，不等我再細細體味，起床號將我從牛虻的世界拉回到現實生活中。上午的農活是鋤地，全班十幾個人一字排開，我站中間，一邊鋤地一邊講書，很快，邊上的人圍上來，鋤地的速度越來越慢，遠遠的連長高聲在喊，“十三班”，我們馬上散開，但一會又聚在了一起。

十三班，多少年以後，在兵團 20 年相聚和 30 年再聚時，我

常常聽見站起來作自我介紹的人說：“我是十三班的，我叫×××”從她們的口氣中，我聽出她們以曾經是十三班的一員而自豪。我們一起吃了苦，但是我們“享受”了這份磨難，16歲去兵團，20歲離開兵團，我們將人生最重要的時期所承受的這份艱難困苦賦予了成長和歷練的意義。多少年以後，當我離開兵團進入社會時，我發現那份苦難沒有白受。每當想起兵團的艱苦生活，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任何難處，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都不會比那更差，在我面前不再有我無法面對的磨難。無論境況多麼惡劣我能堅持我的信念，我知道就個人成長而言，那四年的生活是在一種不能由自己改變的環境，無法發揮個人意志的大時代下，我能選擇的最好方式了。在追求知識的路上有多種方式，如果沒有十年浩劫，按部就班我可能會有另一種結局。

老三屆和那一代知青在整個民族的困境中離開了城市，靠近了幾億農民真實的生活，因為各種各樣的磨難，這些人為存在下去尋找著生命的意義，並在一種信念的支持下選擇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不去埋怨和追悔，而是創造出一種精神力量支撐著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活在當下，創造出有意義的存在方式。多年來每次聚會當談到苦難時，我聽不到憂傷、責難和抱怨而是感受到一種力量。感謝那份苦難帶給我們的堅強，它變成動力激勵我們做有用的事，獲得激情去做改變的事情。

蘇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配不上我的苦難。”現在當我們紀念我們生命中的這個重要時刻時，我已經由當年的16歲到了56歲，我還在工作著，幫助那些身心受折磨的人，我只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配得上當年的那份苦難贈與我的財富。